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外交史研究室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责任编辑：李崇祿

封面设计：丁 品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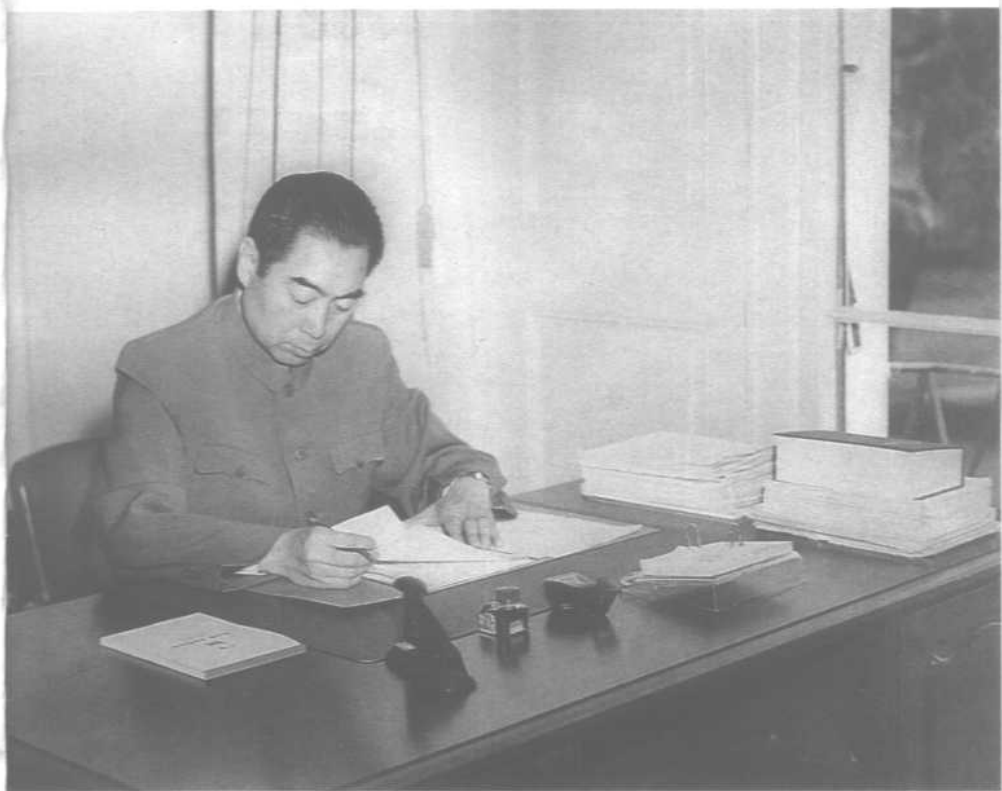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22.5 插页：6 字数：58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7-5012-0529-9/D·97 定价：13.50 元



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在日内瓦的住所内办公。



1950年2月14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1954年6月25日访问印度在新德里机场受到尼赫鲁总理的欢迎。这次访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并倡议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4年5月27日在日内瓦住所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不久双方达成互设代办处的协议。

1955年4月26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机场受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欢迎。





1961年7月11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北京签字后与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等同金日成首相在一起。



1963年10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戴高乐将军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1964年7月10—11日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欢迎。



1963年12月14日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阿联时出席纳赛尔总统举行的招待会。



1970年3月19日在首都机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972年9月29日和
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北京
签署中日建立外交关系
的联合声明。





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即中美上海公报。





1974年3月24日在机场欢迎坦桑尼亚总统
尼雷尔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目 录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代序).....	钱其琛 1
1949年.....	13
1950年.....	15
1951年.....	25
1952年.....	31
1953年.....	42
1954年.....	56
1955年.....	97
1956年.....	135
1957年.....	182
1958年.....	229
1959年.....	250
1960年.....	269
1961年.....	299
1962年.....	328
1963年.....	348
1964年.....	383
1965年.....	433
1966年.....	489
1967年.....	508

1968年.....	522
1969年.....	533
1970年.....	547
1971年.....	576
1972年.....	619
1973年.....	660
1974年.....	696
1975年.....	707
编后记.....	714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代序)

钱 其 琛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外交工作的需要，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全体同志的迫切要求，也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同志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深入学习与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更加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进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开拓创新，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是对他老人家 91 周年诞辰最有意义的纪念。

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建国以后，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长近 9 年之久，为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同志在长达 26 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同志与毛主席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订。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2 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遵循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和初步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⁶

条方针，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作了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

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同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后的停战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一再据理力争，联合国不得不允许我国特别代表走上国际讲台，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在他领导下，新中国迅速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主权和尊严，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鲜停战后，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行并发展和平政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运用这些原则，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也从此开始登上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他亲自“解剖麻雀”，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示范，使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定了周边环境。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1964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对美国，周恩来同志也没有把它排除在我推行和平政

策的范围之外。在同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坚决斗争的同时，周恩来同志一再表示中国愿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既是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又是保持双方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为维护中苏关系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联干涉、控制我国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顶住了毁合同、撤专家的高压政策，显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从朝鲜停战到1965年，与我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逐步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不可分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平外交政策被诬蔑为“三降一灭”，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破坏行动。周恩来同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工作从1968年起就逐渐恢复正常。

70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尼克松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同志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从美国驻波兰大使同我国驻波兰代办的会见到“乒乓外交”，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跨越时代的握手，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我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看到周恩来同志的外交实践可说是

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外交所开创的新局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外交思想和论述十分辉煌。其中见诸文字的，例如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仅由外交部所保存的就有5000多件。这些论述探讨并回答了新中国外交和战后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实际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总体框架。不仅如此，从这些文、电、手稿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为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以下几个主要点。

(一)明确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这就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首先碰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从人类进步的前途看，我们当然要着眼于各国人民、寄希望于人民，但外交工作只能通过发展国家关系来影响人民；外交关系可以有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官方。他强调“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这些论点今天听来已经很熟悉了，但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世界革命”论泛滥的年代，却似中流砥柱，为端正外交工作的基本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伸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决不能让步的。周恩来同志不论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还是同苏联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性都是十分鲜明的。他在建国前就说过，独